

评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生态理论

刘京

(丽水师范专科学校政史系,浙江丽水,323000)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把生态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危机,是牺牲人类的精神和生存来满足资本的扩张。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过程中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技术,主张进行人道主义的革命。这一理论是浪漫主义、消极悲观主义和空想主义的混合,没有多少现实意义。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危机;科学技术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749(2000)01-0009-(0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资本主义盲目掠夺式的生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年代。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的能源危机和生态失控,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生态运动。与此同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主题由侧重于抽象哲学问题转向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生态问题成为他们着重研究的对象之一。他们指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危机,是牺牲人类的精神和生存来满足资本的扩张,为此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自然革命。这些主张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可借鉴之处。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生态危机首先是人性的危机,对人来说,自然界不仅是一种原材料,一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的混合,它还是人类的生活源泉。人只有在与自然界的有机统一中,才会得到快乐与满足。人类应当合乎自然规律地开发自然,而不能只顾自己贪欲的满足,在向大自然索取的同时,要按美的原则“人化自然”,向大自然付出。如果把自然视为可无止境掠夺的客体,那就割裂了人类与自然的统一,人将成为一种没有根基、迷失方向的存在,再也不能从大自然的美好环境中得到本性的净化和升华,无法从自然界中发现自我,只能拥挤不堪、噪噪杂杂和无可奈何地凑合

在一起。这样的人即使物质再丰裕也不可能是幸福和安宁的,只能忍受由于自然的破坏而招来的惩罚和精神痛苦。被人类污毁了的自然界,不再是人的本性自由发展的“天然空间”,而是控制人的“社会伸展出来的手臂”,成为人性被奴役的地狱。

生态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为了继续资本的统治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破坏和盘剥自然,掠夺性地开发,把自然变为用于加工制造,完全为剥削服务的原料。大自然日益屈从于人类的商业组织,成为“商品化的、军事化的、被污染的”自然界。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以私有制和利润为原则,它规模大,资本、技术、劳动力集中,最威胁和损害生态平衡。无休止的竞争使它成为自然界无法承担的重负。马尔库塞认为:“我们必须反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我们必须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保护,使它不再受到阻遏,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推进这项工作。”^[1](P127)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压抑和消费的异化加剧了人们的攻击情绪,资本主义制度对此进行操纵,使人的攻击性广泛深入到社会结构中,并借助于技术工具把攻击性行为引向“侵犯自然”。“这个社会具有一种自杀的倾向”,“可以在个人的本能结构里找到彻底毁灭全球这场游戏的根子”^[1](P9~11)。

收稿日期:1999-10-09

作者简介:刘京(1967-),男,浙江余姚人,讲师,硕士。

二

法兰克福学派在生态问题上虽然已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及生产关系这个根源性问题,但是他们却始终把科学技术看作是最终的超时间、超历史的根源,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技术。他们认为:

第一,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质上是以侵犯人本身为代价去征服自然。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下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使人同自然分离。人类以科学技术巩固了对自然界的统治和支配,但这不是人类的进步。人对自然统治的代价是劳动在社会上和心灵上的划分,这种分工使人类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迫,加深了人性的异化和受奴役。人类在降伏自然的过程中,使阶级关系得到稳定,人们从属于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技术社会所必需的秩序,科学技术进步最终使资本主义专制机器更为完善。因而,科学技术不仅没有给西方人带来永久、无限的幸福和自由,反而对人起压制和奴役作用。科学技术导致非人化,人的成就被用来反对人,凌驾于人类之上。现代社会被全面物化,就连大自然和人的美感都商品化,并且,科学技术渐渐不受人控制,使人退化,人在现代社会这一“沙漠”中寂寞悲凉,人道、伦理、美学和精神因素都蜕化了。

科学技术尤其是促进了劳动和消费的异化。科技进步使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现代社会得以发展高生产、高消费、高福利和商业文化。它塑造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强化并帮助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人们在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高度集中化和协作化的现代化大生产和劳动方式中备受压抑,缺乏自由,只能到商品消费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实现自己的创造欲和满足感,由此导致了富裕社会人们的压抑性和破坏性。

人类的目标不应是对自然的统治,而是与自然的和谐。必须抛弃那种使自然服从于人的“粗野”而“无望”的企图。

第二,科学技术维护着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的掠夺。在当代,科学技术帮助了资产阶级占据了社会的绝对支配地位,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依靠科学技术的维护。

科学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成为一种新型的统治形式,它是新的极权主义者。它通过进一步征服自然,解除物质匮乏,制造和满足人的“虚假需求”,潜移默化地使人们与现存制度同一。野蛮力量的统治已让位给了借助于科学技术手段的更巧妙的统治。这种统治将统治者的意志和命令自然地内化为社会和个人心理,以此控制社会生活各领域。每一件事物都服从于使资本力量永恒化的目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统治形式,是因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或者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它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决不是当代中立的社會控制形式,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晚期资本主义

社会的统治者几乎全都是借助于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来实现对广大人民群众统治。它在现存工业社会中得到特殊的设计和应用,被当作一般的需要手段,构成了人对人统治方式的基础。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操纵性功能已渗透于每一方面,任何人、任何领域都不能摆脱它的控制。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总体体系和文化形式,在为现存社会合理性的辩护中,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并同样具有欺骗性。人们明明生活在一个恶劣和对抗的世界中,麻木和惴惴不安,与自然日益分离,以异化的消费压抑苦闷,它却向人们展示一种和谐美满的假象和值得人们活着的社会幻想,预先封闭人们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阻碍人的自由解放,维护现存统治。在生态问题上,科技发展似乎能够解决问题。相比其他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对人的统治更为直接,它为资本主义现状和不义行为辩护的功能远甚于其它意识形态,单面性、实利性、功利主义、反辩证法以及对现存事物的顺从主义使它理性先验地适用于维护社会统治。

第三,科学技术直接具有破坏作用,会危及生态和整个人类社会。科学技术在20世纪中叶以来的迅速发展,既为人类开辟了新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强人类影响自然的能力,也强化了人们本来就无止境的欲望。在科学技术运用不当和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会造成不良后果,产生由高生产、高消费所引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等危及人类社会和未来的问题。科技文明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人造世界”,彻底“人化”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深深地敌意化。凭借科学技术,人们奴役自然,使其服从于我们自己的目的,直至这种奴役愈来愈严重地破坏了自然。人们的占有欲以及敌意使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宝库是有限的,总有一天会消耗殆尽,而面对人类的野蛮行为,自然将会自卫。

科学技术不能根本解决由它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尽管它提高了人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世界范围内人口的不增长,却面临着两大局限性:一是可居住的和可耕种的土地、淡水、食物以及无法再生产的原料如矿物、燃料等有限资源的供应;二是一旦遭到破坏便无法弥补的生态系统吸收某些污染物如放射性副产品、二氧化碳、余热等的的能力。科学技术在短期内对此无能为力。我们对技术发展的预测,不可能精确到知道哪些原材料在将来能在技术上被替代或者重新制造出来。科学技术促进了人口和生产的急骤增长,促进人对自然的大规模开发,却不能帮助人类突破生物学上环境能力的极限。因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导致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同時毁灭,人类社会终将因环境污染而湮灭。

三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一切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性。繁荣带来了异化,科技进步导致了对人本能的压抑和人类自身的毁灭,因此必须同现有的所有事物完全、彻底决裂,否定并摧毁一切社会文明,包括建立在文明、科学技术之上的社会制度。在他们看来,只能从人的解放和健全这一方面进行革命,重建一个肯定人的意义和价值,使人性得到改善和完美的人道主义的健全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放自然,消除生态危机,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他们赞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即按照人的本质占有自然的思想。马尔库塞认为,自然革命的问题在于人本身,首先要从改变人,改变现存社会造就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心理类型和生理机制入手,进行人的本能结构革命和自然观革命。这场革命是为了人的自我实现和克服异化,使自然获得解放,人道地占有自然。要建构一个以人中心,满足人的主客观需要,人不再是消费商品和实现利润工具的健全社会。还必须特别规划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方向,使它符合人性和生态化。要发展一种不是对自然进行“压抑性的统治”,而是“解放的统治”的新技术,它能在影响自然中解放自然,允许自然成为它“愿意”成为的样子。这样,人们不必再用侵略和压迫维护自己的生存,个人最终有可能创造一个不再有暴力、丑恶、无知与残忍盛行其中的技术与自然环境。与新技术相适应的是符合“生态学规模”的生产方式,它将是规模小,能源、劳动力、资本、技术需求程度低,对自然危害较轻的状况,能够克服现代工业社会大规模生产的弊端。

四

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抓住由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并日益突出的人和自然关系这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力图以马克思的理论为指导寻求答案,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马克思的思想对解决当代现实问题的意义,扩大了它的影响力。他们立足于人的日常生活范围,抨击资本主义社会人性的失落和“一体化”的新控制手段对人精神的压抑;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关系及其各种危害;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物的颠倒关系和利用科学技术进行非人掠夺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强调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些主张能够激发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起来批判、拒绝资本主义制度,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尽管从理论和现实上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激烈、愤慨的批判,却没有能进一步提出有实践意义的革命措施和步骤,正如一些批评家们所说,批判理论是一种“缺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它最鲜明的特征是批判性而非建构性。即使马尔库塞最后一部总结学生造反和新左派运动的重要著作《反革命和造反》仍然是如此。“主动挑衅”和“大拒绝”等战略的意义仅仅在于,它能使人们发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具有反抗和抵制资本主义的作用,却无法从根本上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能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战略,只能把人们引向冒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是该理论所以在青年学生和新左派运动中富有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五月风暴”中的口号如“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我们要一个新的独创的世界,我们拒绝一个用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等都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通俗化。虽然他们不象西方许多学者那样超越制度去探寻生态危机的原因,也并不停留在人口、消费、环境污染等表面现象上,而是明确指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但同时,他们又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他们要进行的自然革命主要是“本能革命”、“意识革命”,从抽象人性着手完成人和自然的解放,这样不可能找到解决资本主义异化和危机的现实道路。

他们视科学技术为影响现代历史和社会的完全独立、决定性的因素,把当今社会已有和将有的灾难都归于科技发展,错误地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因而无法更深入地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看不到科学技术不仅能维护现状,使统治合法化,而且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分工和协作日益社会化,促进企业兼并,使垄断资本更加集中,最终将加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速资本主义灭亡。他们给科学技术本身规定了许多消极作用,这是片面和错误的。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看作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2](P372)科学技术产生消极作用,既出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也有制度原因,即谁出于什么目的在什么制度下怎样利用和发展科学技术。马克思指出,人民的幸福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不能把科学技术看作是制度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他们的理论是浪漫主义、消极悲观主义和空想主义的混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对解决生态问题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